

语言功能审视与结构主义批判*

——亨利·瓦尔德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及符号学思想

张 碧**

【摘要】 罗马尼亚哲学家亨利·瓦尔德，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本立场与方法，对语言哲学及符号学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深入论述：在关于思维与语言的关系方面，提出了语言在智力与智性中各自的建构作用；在论及书写符号及其人文意义时，探讨了书写符号的语义特征及在现代社会语境中的辩证特性；同时，从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角度对正统结构主义思潮及其符号学方法进行了辩证性反思和运用。由此，瓦尔德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语言哲学及符号学的诸多论域进行了独到的思考和论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 亨利·瓦尔德；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符号学

DOI:10.16762/j.cnki.mkszyzyj.2022.01.014

对语言现象、语言哲学及符号学的探讨业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界的显学。经典马克思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东欧马克思主义都从不同角度对这一论域做出了深入探讨。其中，在东欧马克思主义范畴中，罗马尼亚哲学家亨利·瓦尔德（Henri Wald）从马克思主义方法出发，对语言与书写关系等语言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与分析，尤其对20世纪“语言转向”中的结构主义思潮做出了极为独到的探讨，从而在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及符号学领域中开辟了独树一帜的理论观点。遗憾的是，在中国当代学界，瓦尔德的哲学、符号学思想似尚未得到任何关注，鉴于这种情况，本文拟对其基本学术论点进行分析与探讨。

一 思维与语言的关系

远在20世纪西方思想界的“语言转向”出现前，关于语言现象的产生、性质等问题就已经引发了西方思想者的重视。其中，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等经典论题，尤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欧马克思主义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5ZDB022）的阶段性成果。

** 张碧，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其得到了诸多学者的深入考察。仅以德国近代思想传统而言，赫尔德便曾提出，人类语言相对于动物语言而言，其基本差异体现在人类能够运用基于理性的思维及反思力量而建构语言体系^①；受其影响的威廉·洪堡特同样指出，作为脑力活动的思维，必须借助语言这一庞大的体系才能得以进行^②，等等。无论后世学界做出怎样的全新解释，思维决定语言这一观点，早已成为西方语言哲学界的主流认识方式。这种认识当然有其合理性，然而，却往往未能从人类社会生产劳动的角度予以更为深刻的解释，对此，马克思即指出，语言及其他符号体系，无不是人类在社会生产活动过程中，由于彼此进行交流与合作的需求，而创制出来的交际工具，换言之，语言，是人类在对劳动对象和劳动过程进行理性思考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表意实践的产物。

正如某些学者所言：“瓦尔德关于语言、思维、归纳、演绎……论域的讨论，都是在纯哲学的思考中进行的。”^③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瓦尔德，正是在辩证法等哲学方法的基础上，以其独到的学术观点，对这一传统论域进行了深入探讨。

瓦尔德认为，人类思维中存在智力（intelligence）与智性（intellect）的差异。所谓智力，是人类先天具有的应对周遭外界信息的反应能力。面对表现为时间与空间形式的周遭世界，人类能够以其先验能力对诸多现象进行加工和分类，使之成为个体化知识，并由此适应这个世界。此处，瓦尔德将人类应对外界环境的基本能力界定为“智力”，这与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人类认识能力的规定有共通之处。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在描述这种人类认知能力的过程中，虽在事实上将这种认知能力界定为建立意义的方式，然而，却未充分说明语言在建立人类“智性”方面的基础意义。与之不同的是，瓦尔德认识到，在智性的建构过程中，语言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唯有通过语言、并在语言的环境中，智性才能得以形成和发展”^④。换言之，所谓智性，指通过语言途径而使智力得以实现的具体方式。

智力是人类所具有的先验性认知能力，然而，任何一种认知活动，都必然是在经验活动中，对康德所谓的作为现象的杂多进行统合、并为其建立意义的方式，这正是胡塞尔在其现象学理论中赋予“立义”功能以重要地位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在统合诸多杂多的现象的过程中，为其赋予意义的最主要的途径，便是以作为符号体系的语言，对本来浑然一体的外在现象领域进行符号分节（articulation），并由此对现象领域建立认识的系统化的智性过程。这恰是瓦尔德认为智性必须通过语言途径方能实现的缘由。

① 详见〔德〕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反纯粹理性——论宗教、语言和历史文选》，张晓梅译，商务印书馆，2010，第35~48页。

② 〔德〕威廉·冯·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姚小平选编、译注，商务印书馆，2011，第1~3页。

③ M. Mark Mussachia, "Introduction to Dialectical Logic by Henri Wald", in *Science & Society*, Vol. 43, No. 2, 1979, p. 242.

④ Henri Wald, "No Thinking without Words", in *Analecta Husserliana*, Vol. XXVII, 1989, p. 508.

在瓦尔德看来，尽管智性必须通过语言方能实现，但这与同样必须经由语言途径方能进行的思索（thinking）这一思维过程并非一回事，原因在于，“智性由建立概念的基本逻辑调节，而理性则遵循它们在运动中的辩证逻辑”^①，智性仅凭语言概念的一般性表意逻辑来进行。然而瓦尔德认为，人类思维的过程，是一个更为复杂、更具风格特征（stylistic）的过程，其中，思索过程虽同样以语言为媒介，但它更多地体现出对语言的不同表意功能、指示功能及语汇风格的极为庞杂的符号体系的征用。众所周知，西方形式主义批评理论往往将语言界分为“日常语言”“诗性语言”等，亦即注意到语言自身所具有的日常交际功能与诗性情感语言的区分。与之类似，瓦尔德同样意识到，由于思维自身活动由“认知性”和“情感性”两种不同类型的范畴构成，因此当其转换为语言时，也便相应地使得语言分别体现出纯逻辑形式和具有某种诗性意味的喻旨性修辞形式，“前者体现为观念、判断、理性等逻辑形式，后者体现为隐喻（tropes）和比喻（figure）等风格形式”^②。也恰是因为这一原因，尽管同一种语言可能源自同一种思维，但由于思维自身的复杂性，因此在通过语言而进行思索的过程中，便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思维状态，以瓦尔德的观点来表述，便是思索能够体现出语言中所渗透着的理性思维的同一性（identical）和渗透于多样化的语汇中的多样思维特征。质言之，智性活动依赖于一般性单义语言，而思索则体现出语言的情感性、多义性的特征。

毫不夸张地说，对思维和语言之间关系的深入认识，正是瓦尔德以马克思主义方法来认识语言现象的重要体现之一，而这种认识方式，也有别于18世纪以来西方语言学的传统认识方式，从而体现出瓦尔德关于语言哲学及符号学的全新思考途径。

二 书写符号及其人文意义

书写，是语言在获得文字化表达后的一种文化形态。在西方文明史上，书写是一种对语言及其思想内容的记录，其基本功能在于利用符号形式来保留信息，使之免于口头交流即时性的不便，“即便是抽象的概念，通过这种‘坚固的符号系统’（solidifying symbolic system）也能够用字形表现出来。这种系统的产生，根源在于人类受空间和时间的局限……交流的前提需要对信息进行存储”^③。可见，书写的历史的变迁标志着人类文明发展的飞跃。

书写符号是人类语言及其意义的特殊凝结方式。在瓦尔德看来，书写符号形式的变迁，也是人类思维形式的表征。如果说象形文字以美国逻辑符号学代表人物皮

① Henri Wald, “No Thinking without Words”, in *Analecta Husserliana*, Vol. XXVII, 1989, p. 509.

② Henri Wald, “No Thinking without Words”, in *Analecta Husserliana*, Vol. XXVII, 1989, p. 509.

③ [新西兰] 斯蒂文·罗杰·费希尔：《书写的历史》，李华田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第1页。

尔斯所界定的像似符 (icon) 形式, 体现出人类先民对事物的某种程度的感性直观方式, 那么表意文字则意味着人类思维的进一步抽象化、概念化。尤其是表音文字, 标示着“音”与“意”两种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的结合, 而这种结合方式——亦即索绪尔所说的约定俗成性、任意性——也同样意味着人类思维能力的发展。

不可否认的是, 书写与口头语言在人类智性、思维的发展方面, 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相对于口头语言而言, 书写语言在协助人类的智性的建构方面同样能够发挥功能。同时, 书写和口头语言之间也存在互为转化的关系, “书写能够提升话语的逻辑的连贯性, 而话语也能够使书写的这种能力得到恢复”^①。尽管瓦尔德并未对这种观点进行充分阐释, 但可以作如下理解, 即书写的过程不仅是对话语进行方式的记录, 同时也是对话语中最为符合逻辑、最为富于理性的阐述方式的酝酿, 是对话语过程中理想陈述方式的沉积; 而相应的, 口头语则是人类思维最为本真而直接的表达方式, 相对于书写而言, 由于在生活中与他人交际的过程里使用得更为频繁, 也便更接近思维最为本真的状态。尽管如此, 书写却更容易表现人类的智性和思维能力, 更容易体现出人类智慧的结晶。

瓦尔德最为关切的, 是遵循不同媒介的符号形式在表意效果方面的关系与差异, 并力图从中发掘人类精神结构的建构方式, 以及文明样态的发展脉络。在这一基础上, 他认识到, 在书写的范畴中, 手写和以其他工具所进行的书写活动同样存在差异。例如, 用打字机打印出的文字, 与用手写的文字相比, “似乎前者更具外延义 (denotative), 而后者更具内涵义 (connotative)”^②, 换言之, 打字机书写是一种标准化、程式化的写作方式, 除了文体风格外, 书写者在文字层面的风格无法体现; 同时, 在手写的过程中, 作者本人所具有的对时间的理解、对美感的独到体验, 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彰显。显然, 打印—印刷文字和手写文字间的差异, 一方面体现为机械化表达和人类个体审美表达间的不同, 另一方面, 打印—印刷文字作为现代社会重要的文明形态, 其文化价值和缺陷必须得到辩证性的认识。在瓦尔德看来, 打印—印刷文字的准确、精密的表现、描述客观事物的工具理性属性应当受到批判, 当语言像数字一样一味地用来描述客观事物的“量”时, 它“无法通过内在的因素获得意义的丰富性, 而只能通过外部条件来实现这一目的”, “算术的智性意义只反映数量化的关系”^③, 这种认识与列斐伏尔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类似观点较为接近: 他们都以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文化景观中语义的狭窄化倾向进行批判为基础, 表达出对打字机或印刷技术等现代化书写方式的现代性焦虑情绪, “拼

① Henri Wald, “Reflections on Language and Thought”, in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translated by J. Murra, No. 1, 1975, p. 53.

② Henri Wald, “Reflections on Language and Thought”, in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translated by J. Murra, No. 1, 1975, p. 53.

③ Henri Wald, “Reflections on Language and Thought”, in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translated by J. Murra, No. 1, 1975, p. 54.

音性书写不仅是思维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是一种严重的危险”^①。但同时，瓦尔德也认为，印刷性书写更能体现出人类思维的统一性和严密性，因此，也便更适合表达出人类的文明结晶。可见，瓦尔德此处是从价值论的角度，对书写方式的不同表意特征采取了“一分为二”的辩证性审视态度的。

关于不同文字形态对于东、西方文明各自的意义，西方学者曾表达过诸多不同观点，其中德里达的论述最具代表性。德里达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西方哲学传统出发，表达对西方表音文字的批判，以及对以中国汉字为代表的东方表意文字的欣赏。对于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的关系及其文化内涵，瓦尔德不仅做出了独有的分析，也从价值论角度表达了自己特有的认识。

众所周知，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曾从结构主义符号学角度出发，对法国菜肴、法国时尚服装等一系列事物中的语法关系进行了细致梳理。在他看来，在这些西方文明事物中，往往是由某种潜在的语法结构，亦即索绪尔所说的语言（langue），控制着充满由语言符号般的组成元素组合而成的具体语义链，亦即言语（parole），“（在索绪尔意义上的）言语具有组合性质，因为在其多种多样的发音之外言语可定义为（重复出现的）记号的（各种）组合”^②，具体而言，无论是菜品之间的组合方式，还是服饰元素之间的配合方式，都根据某种特有的语法规则而形成某种意义向度。在瓦尔德看来，这种意义向度之所以能够产生，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拼音文字的“语言”“言语”属性，使得西方人按照表音文字的组合形式来逐次建立概念的意义链，“逻辑形式的形式内容反映了非常广义的基本属性和关系”^③，但同时，也限制、框范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使其自然而然地以某种“拼音式的组合”方式来理解对象之间的关系，也使得西方人在西方语法规则的某种潜在的影响下，形成了以类似于“语言”“言语”的方式来审视文化现象的习性。

在瓦尔德看来，就日本文化而言，由于对表意性汉字的运用，其语言文字类型与西方语言存在差异，因此日本文化并非如西方文化那样，形成一种通过概念化的拼音文字来解码隐藏在其深层的隐喻意义的思维范式，亦即并未形成一种类似于西方语言文字中的“语言”“言语”——亦即本质/现象的二元对立格局。巴尔特注意到，在日本插花艺术中，“不是去解读（解读其象征意义），而是重新找到书写者之手的踪迹：这是真正的书写，因为它制造了一个体量，并拒绝让阅读成为对（高度象征性）信息的简单解码，它让阅读能够重新追索书写工作的轨迹。”^④也就是说，在表意性汉字中所凝结着的日本文化特有的社会心理结构，并非像西方语言

① Henri Wald, *Introduction to Dialectical Logic*, Bucuresti: Editura Academiei, 1975, p. 29.

② [法] 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46页。原译文中的法文词“记号”（signe）即英文词“符号”（sign）。

③ Henri Wald, “Le Contenu Formel du Concept”, in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No. 2, 1968, p. 224.

④ [法] 罗兰·巴尔特：《符号帝国》，汤明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第49页。

文化那样遵循某种程式化的深层结构，而是将诸多彼此没有逻辑关系的物象同时呈现出来，使个体根据自己的个人体验去考察和思考其中的意义内蕴。可见，日本表意文字的这种特征，不仅体现出日本文化中事物间缺乏逻辑语义关系的状况，而且也造成了其自身与西方语言文化间巨大的差异。

三 对结构主义思潮及方法的阐释和运用

肇始于20世纪初的结构语言学及结构主义思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语言学转向”的产物，并曾在半个多世纪内受到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同时，对稍晚形成的东欧国家的学术领域同样存在某种程度的影响。在这种学术语境中，包括波兰的亚当·沙夫、捷克的史丹内等东欧马克思主义学者，分别从不同学术维度批判性地分析和探讨了结构主义思潮及符号学的基本背景、范畴和属性。与之类似，瓦尔德同样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批判性地审视和讨论了结构语言学、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的各种属性及特征。

作为思想方法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由于在不同学者那里得到了不尽相同的阐释，因此在运用领域和运用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然而，在结构主义的正统代表、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那里，“结构”却一如结构语言学的“语言”（*langue*）一般，被界定为原始社群中普遍性无意识心理结构，它潜在地支配着这一社群的语言、社会生产形式及伦理交际方式等诸多领域。众所周知，年轻时的列维·斯特劳曾试图将这种心理结构阐释为上层建筑，以此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有所助益，他的这种认识，是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间最早的对话尝试之一^①。对此，瓦尔德也承认，“无疑，马克思同样认识到了结构分析在方法论上的有效性，这种分析引导他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基础建筑（*infrastructure*）和上层建筑”^②。显然，与列维·斯特劳类似，瓦尔德充分意识到了作为人类学认识范畴的“结构”的意识形态意义。

在列维·斯特劳那里，社群成员的集体结构形式，是一种形而上学式的先验性存在。从本质上来讲，这种立场将人类的群体形式认定为一种抽象的集合，也使得人类个体的基本属性遭到遮蔽，结构也便成为一种对社会存在的组织方式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一如瓦尔德所言，“结构成为了某种专横的东西，它的诸多组成部分的属性于是被剥夺殆尽”^③，结构主义理论也由此带上了原子主义式的理论色彩。

① 参见 Claude Lévi-Strauss,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translated by Claire Jacobson and Brooke G. Schoepf,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63, p. 58. 亦可参考张碧《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人类学方法的嬗变》，《中外文化与文论》2017年总第35辑，第298页。

② Henri Wald, “Structure, Structural, Structuralism”, in *Diogenes*, translated by Nicolas Slater, Vol. 17, No. 66, 1969, p. 16.

③ Henri Wald, “Structure, Structural, Structuralism”, in *Diogenes*, translated by Nicolas Slater, Vol. 17, No. 66, 1969, p. 17.

近代德国哲学家卡尔纳普曾提出还原论思想，认为对象往往能够被还原、分解为诸多组成部分。事实上，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在相当大程度上遵循了这种还原论设想，且将诸多组成部分理解成了以某种规律组织而成的、缺乏个性的对象。这种理解方式，恰恰应和了卡尔纳普的还原论思想，但也忽视了“人”这样一种存在既有群体属性、社会属性，同时却又拥有个体独立属性的存在。

马克思曾指出，人是类属性和个体属性的统一，而社会关系是人类个性或个人能力得以产生的基础，“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①，显然，马克思是十分重视个性或个人能力的考察的，也由此体现出对个体属性和类属性间关系的辩证性思考。因此，在瓦尔德看来，列维·斯特劳斯一味地从群体、同一性的角度来认识人性，显然与马克思的立场存在较大的差异。

瓦尔德认为，个体的活动方式，以及个体之间的交流方式组织方式，并非决定于某种先验的结构模式，原因在于，人类因其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及生存处境，而具有至为不同的生活体验，也因此促成了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丰富性；同时，“形式中能够存在的事物越复杂、丰富，它们的属性便越无法被简化为一系列的关系，或曰组成部分的相关的独立性越无法被简化为绝对的独立性，例如结构”^②。瓦尔德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认识到，作为鲜活生命的人类个体，往往因为其生产及生活的环境的不同，而发生相应的变化；而生存环境的变化，直接导致人类在习性、文化伦理观念等诸多方面产生差异。这样，外在环境条件及人的心理结构的多样化，便使之在生产、生活的组织方式等诸多方面同样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从而无法被归结为某种恒定的结构，更无法从某种先验结构中得到充分的具体化展开。因此，人类的活动绝不是由结构来决定的抽象符号，而往往会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体现出鲜活而具体的个体属性。

与多数秉承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瓦尔德意识到了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中潜藏着的结构语言学的僵化逻辑，按照这种逻辑，作为意识形态的社群“结构”，是以一种先验性群体心理模式而作用于社群各种活动的组织方式——亦即生产关系的^③。显然，列维·斯特劳斯的这种认识未能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认识到作为上层建筑的“结构”与作为生产关系的社会组织方式间真实的关系。正是由于认识到了他的这种偏见，瓦尔德提出了一系列批判性的意见。他将包括列维·斯特劳斯的先验性心理结构在内的诸多外在自然环境称为“自然”，认为这种体现人类组织形式的“自然”是由人类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而非由它决定了生产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12页。

② Henri Wald, "Structure, Structural, Structuralism", in *Diogenes*, translated by Nicolas Slater, Vol. 17, No. 66, 1969, p. 17.

③ 关于列维·斯特劳斯的这种认识，可参考张碧《阿尔都塞理论的符号学再阐释》，《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系，质而言之，“结构主义消解了处于社会结构中的人类个性，而它正是从社会结构中并通过社会结构彰显了其自身。”^①

具体而言，“人类通过发明工具和语言的方式，将自己从自然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并由此开始具有文化的特征”^②，正是由于在改造自然的集体性生产活动中，人类才不得不使用语言的方式来认知世界，并在生产与生活活动中以之进行交流。然而，人类的语言能力并非像列维·斯特劳所说的那样，与其他的社群人员的群体性先验心理结构一样，全然是一种人类所固有的抽象能力，而应当是人类在社会具体实践过程中所进行的某种自由的、能够决定语言和其他技艺使用方式的特殊能力。换言之，人类总是在对自然的延伸和改造的辩证过程中发展着自己的各种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一方面通过对自然的加工、改造而体现出个体独到的实践方式，另一方面，也由此体现出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属性，“人既是社会性的存在，同时也是个体性的存在。社会最高级的产物，是人的创造性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③。在这种前提下，人的个体性创造和类属性之间实现了辩证的统一，也恰恰体现出马克思关于人的个体属性和类属性的辩证性认识，只不过这种集体性结构并非先验生成，而是由特定社群中人的某些具有特定规律性的生产方式所产生的。

正是由于包括语言在内的诸多人类意识形式同时具有个体性和结构性的双重特征，因此，由诸多个体所构成的群体性结构在保持了某种系统性的同时，每个个体也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属性。就语言而言，由于既有个体自己为其赋予的情感、伦理性质，同时，又带有社群内统一性的语言语法结构属性，因此从结构主义角度来讲，“言语”（parole）和“语言”之间形成了某种语义内在的弹性，这样，瓦尔德在事实上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当前者的效果大于后果时，语言的表意方式便更具个性或曰表现性；当后者效果大于前者时，则语言更趋近于不具有隐喻意义的日常语言^④。

瓦尔德认为，结构主义在实质上只是一种将人类的先验“自然”属性视为人类的语言、社会组织形式意识等方面起决定性因素的意识形态，而相应地忽视了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具有的个体属性，这便使得学界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倾向于形而上学化。事实上，这种认识是瓦尔德的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观念的体现。众所周知，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欧洲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发生过“人本主义”和“反人本主义”的论争，后者通过将人类的生产方式再生产阐释为结构的作用，在

① Henri Wald, "Structure, Structural, Structuralism", in *Diogenes*, translated by Nicolas Slater, Vol. 17, No. 66, 1969, p. 24.

② Henri Wald, "Structure, Structural, Structuralism", in *Diogenes*, translated by Nicolas Slater, Vol. 17, No. 66, 1969, p. 17.

③ Henri Wald, "Structure, Structural, Structuralism", in *Diogenes*, translated by Nicolas Slater, Vol. 17, No. 66, 1969, p. 18.

④ 参见 Henri Wald, "Structure, Structural, Structuralism", in *Diogenes*, translated by Nicolas Slater, Vol. 17, No. 66, 1969, p. 19.

事实上将人类历史发展抽象化为“结构”的产物，而前者则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人本化的阐释，认为“人”才是历史的真正缔造者。显然，瓦尔德是从一种更为辩证的角度来审视“人”与“结构”这组看似对立的范畴的：一方面，他看到了特定社群中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对个体发生作用的某种结构；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个体在语言、生产等诸多方面所具有的个性特征。这种认识，体现出瓦尔德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立场和结构主义立场间关系所进行的辩证性阐释。

此外，瓦尔德也以这种对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的全新认识，来解释现代艺术的基本特征。在他看来，每件艺术品同样可以被视为一个由结构起潜在支配作用并由具体艺术语言媒介构成的综合体。艺术语言——例如绘画中的色彩和线条等，与语言一样，同样带有艺术创作者个人的风格色彩，是其审美、伦理及生理等层面的个性的外在表现。这样，在由结构所支配、安排和赋予的能指形式，与创作者赋予能指形式的所指之间，便存在某种“距离”或张力，亦即表意过程的理据性（motivation）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①。因此，艺术品的能指语言与所指内容间的关系，便体现为其客观外在结构与创作者自身的一系列主体因素的关系，能指形式的基本语义逻辑是表达作为所指的创作者主体因素的基础，但同时，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成为衡量艺术品审美价值的重要标准，“如果两者间的距离太小，那么作品便乏味而庸俗；如果距离过大，则作品需要得到阐释。”^②这种阐释方式，显然是瓦尔德对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在艺术批评领域中的独到运用，且尤其适用于对现代主义艺术的批评。

四 结语

综上所述，瓦尔德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对思维、智性及书写符号的关系，及其在西方文明的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尤其是对风行一时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进行了人本主义立场的辩证性审视。在欧洲人文社会科学界普遍受到“语言学转向”影响的学术语境中，瓦尔德的这些认识与论述，都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与符号学领域的思想，同时也为东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① 此处，瓦尔德以“significatum”一词来表达“所指”。

② Henri Wald, “Structure, Structural, Structuralism”, in *Diogenes*, translated by Nicolas Slater, Vol. 17, No. 66, 1969, p. 19.

Review of Linguistic Functions and the Critics of Structuralism: Henri Wald's Marxist Philosophy of Linguistics and Semiotics

Zhang Bi

Abstract: Romanian philosopher Henri Wald, taking Marxist theory as the basic position and method, made a series of discussions on the field of philosophy of linguistics and semiotics.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oughts and language, he proposed the respective constructive role of language in intelligence and intellects. When discussing on writing signs and their humanistic significance, he discussed the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writisigns and their dialectic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atmosphere of modern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from the humanistic angles of Marxism, the orthodox structuralism and its semiomethods were dialectically reflected and applied. As a result, Wald made a unique reflection and discussion on Marxist philosophy of linguistics and semiotics, and made a contribution to Marxist theories.

Keywords: Henri Wald; Marxist; Philosophy of Linguistics; Semiotics